

魏晋南北朝

辽宁人民出版社

文学意识的历史嬗变

王巍◎著

魏晋南北朝文学 意识的历史嬗变

WEIJINNANBEICHAOWENXUE
YISHIDELISHISHANBIAN

王 巍 著

辽宁人民出版社

© 王 巍 200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的历史嬗变/王巍著. —沈阳:
辽宁人民出版社, 2006. 12

ISBN 7-205-06119-9

I. 魏… II. 王… III. 文学史—研究—中国—魏
晋南北朝时代 IV. I209.3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45543 号

出版发行: 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编: 110003

电话: 024-23284324 (邮 购) 024-23284321 (发行部)

传真: 024-23284191 (发行部) 024-23284304 (办公室)

网址: <http://www.lnpublish.com.cn>

印 刷: 沈阳百江印刷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 146mm × 208mm

印 张: $9\frac{7}{8}$

字 数: 240 千字

出版时间: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那荣利 修建光 李 赫

封面设计: 杜 江

版式设计: 王珏菲

责任校对: 徐丽娟

定 价: 20.00 元

王 巍 女，1945年生，辽宁大学文化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出版的主要著作有《建安文学概论》、《建安文学研究史论》、《三曹评传》、《建安七子论稿》、《曹氏父子与建安文学》、《诗经民俗文化阐释》等，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曹操的文艺思想与创作实践》、《试论曹植的文艺思想》等几十篇。

魏晋南北朝是文学的自觉时代，是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相当繁荣时期。这时人们的文学意识随着频繁的更朝换代而不断地发生变化。如建安时期表现了强烈的个体生命意识，两晋时期突出表现了玄理哲思，同时又表现出多种艺术审美追求。元嘉之后，人们逐渐追求形式美，刘勰文学思想含蓄丰富，南朝与北朝又展示了人们不同的文学意识与审美追求。本书探讨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不同阶段的文学意识及其历史嬗变过程，从而展示了魏晋南北朝文学意识发展脉络及其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影响。

前 言

时下，太多的问题向学术界提出，要求学术界解答。

学术界的门庭若市是大规模、全方位的社会转型或社会变革所至。这样的转型或变革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初，至今有 20 余年，期间跨越了世纪之门，这是一场真正意义的辞旧迎新的变革。像历史上所有类似的社会变革一样，都经过一个难免的相对混乱的阶段，这是旧序解构新序建构的新旧交替所至。在这样的相对混乱中，学术混乱也随之伴生，这是因为学术中相关社会之理、人生之理的那一部分，其本身就是社会秩序的理性形态。旧序解构，当然要解构旧序的理性形态；新序建构，当然也要建构新序的理性形态。于是在这样一个相对混乱的阶段，学术活动就难免奔忙于解构与建构之间，就难免有所失措，有所浮躁，有所不循、规范。而且，从某种意义说，现实社会生活的阶段性的相对混乱，学术解构与建构纠缠交替地进行乃是一个重要的引发原因与伴随原因。更何况，社会的解构与建构，学术的解构与建构，均离不开学术的理性指导，而承担指导之责的学术本身又正处于解构与建构的忙乱，这就更使得学术活动忙乱不堪。近年来，学术界在随时与导时、循利与述理、追西与续中、旧势与新论、正统与多元之间左奔右突，就是这种忙乱的具体化。近两三年来，大规模的社会变革渐入有序，格局渐明，与之相应的学术领域也日见头绪。解构渐成随附，建构渐成主导，而且建构的形势也日渐明朗。这是

一个时代理性积累的过程，也是深化学理涵养的过程，学术界人士都在其中，也都在学术理性的解构与建构中求静于动地进行学术修炼。付诸出版的这套“中国文学与传播”丛书，就正是一批充满活力又学力很强的中青年学者积极进行所事领域理性建构的成果，也是大家不断深化学理培养的过程性结晶。

这套书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它对待传统的态度，二是它的生存论哲思体系。

如何对待传统，是时下学术领域共同面对的一个大问题。因为社会秩序解构也好，学理解构也好，都有个解构取向问题，即向哪个方面、循着怎样的理性脉络解构。这就涉及传统问题，因为无论自觉与否，传统都以其历史延续性构入现实，并在转向与取向中潜移默化地发生作用；建构也是一样，社会秩序建构也好学理建构也好，也都有缘何而建构向何而建构的问题，在建构问题的求解及建构实践中，无论自觉与否，大家都时时与传统相遇。有学者说，传统是现实的历史形态，说得很精辟。现实不可能是脱离历史的现实，历史就延续在现实之中，并从中规定现实。诚然，历史发展存其跳跃性，并不断地体现着断代特征，但跳跃与断代，绝不是历史的摆脱或历史延续性的切断，而仅止是历史或历史延续性的延迟到场，并且它总是随后就到，最激进的变革者们也总能在变革后的大街上随时与它相遇。传统作为历史，传统的现实化作为历史延续，就这样的与现实不可或分，这就是传统问题愈是在变革时代愈是突出的原因。

传统既在，那么传统又何在？这同样是近年来学术界关注并多有争论的问题，有视传统为习俗者，有视传统为文物者，有视传统为语言者，以至于当有些习俗或文物因某种原因而消失时，学界就有人惊呼传统无继，传统还有多少，要拯救传统。其实，习俗、文物、语言，都是传统的东西，但传统又远不止于这些东西。传统并不是单摆浮搁的存在物，它永远是

一个敞开的变体，它不断生成，并不断因时而变。就其形态特征而言，它很像人的生命或个性，每个人的生命与个性都具有相当的稳定性及不可易性，也都有明显的可辨识性，但这并不影响它的现实敞开与随时变化，儿童的、少年的、青年的、中年的、老年的，人生哪个阶段不有生命与个性贯通？但人生的哪个阶段又与它的此前阶段相同？这是传统的形态理解。这样的理解，见于“中国文学与传播”的每一部书，各部书的共同努力就是找出各自所研究课题中传统是以何种形态延续，又是以何种形态在延续变化的，又进而把这样的延续与变化突出出来，构成研究的基本思路。中国民族传统的生成性与同化力相当强大，这与它的根深蒂固相关，也与它最初形成的生态环境与适应生态环境的原始智慧状况相关。历史在久远的、冰冷的打磨中淘汰了大量不适应者，而适应者的精华凝聚为文化学家所说的文化特质或文化焦点这类东西。只要这类特质或焦点还有一点形态性留存，它就可以像胚胎一样裂变而终于又成整体亦即又成传统，它就又可以在大体相同的环境中再生出孔子、老子，再生出一个中国传统的社会发展过程与民族发展过程。这种传统的特质性追问，也是这套丛书体现于传统研究的精要。

而上述传统研究特点，作为研究方法，则属于传统生存论。对于传统生存论的研究、运用，正构成这套丛书的生存论哲思特点。有些学者习惯于按照西方的学说谱系对照中国的学术或学理研究，然后将之归入西方的某种序位，如前些年用西方的主客观论对照中国的孔子或老子，近年来又用西方的生态学说对照中国的生态论传统，用西方的现象学对照中国的浑融思维。对比研究固然可取，但以西律中或以西立中就难免扬西抑中或不着边际。生存论研究也面临同样问题，一些中国学者一提生存论就首推柏格森的生命哲学、尼采的体验哲学、海德格尔的存在论哲学等，时下，又靠上了福柯的生命体验。其

实,中国的生存论可谓源远流长,是中国的哲思传统与众学之母。它活跃于有机整体性之间,专门在生成、转化、交融、互动这些生机贯通之处探寻玄机、揭示哲理。天人合一、情景交融、象外之象、味外之旨、形神交互、风骨相间、气韵意境、体用相是,等等,都是中国古人格外用智也格外见智的地方,而这些地方又恰是避合重分的西方学术所避之不及的地方,西方人不仅对这些地方讲不清,而且他们就根本不肯面对这些地方。进入20世纪,西方人发现了这一点,承认这是世界的重要构成或重要形态,因此才有了柏格森、尼采、弗洛伊德、胡塞尔、海德格尔乃至福柯的相关探索,但这种探索比起中国传统的生存论,在很多方面都语焉不详,只不过西方人的传统思辨体系,使西方人后来的这些相关表述更成体系而已。

此套丛书在各自课题研究中,共同坚持着传统的生存论哲思,取象于化,求势于动,重视研究对象的有机整体关系。由于各自课题的研究对象,本身就是中国的传统生存哲思中形成的现象或文学、文学理论结晶,因此,用生存论的方法予以研究,正是解铃还须系铃人,是此招入此式,因此也就更为贴切和顺理成章。

时下对于某一大课题的集群性研究正逐渐成势,这与国家组织课题的方式密不可分,如各种国家社科选题,各种选题的工程性管理,都为这种集群性研究提供了方便,集群性研究便于展开讨论,便于思想碰撞,便于相互启发与集思广益。这些集群研究的优势,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这套丛书的各部著作中。

高楠

2006年11月24日

目 录

前 言	(1)
引 言	(1)
 第一章 人性觉醒的建安论坛	(10)
第一节 变动不居的社会思潮与变化的士人心态	(10)
第二节 建安文学意识的新趋向	(20)
第三节 追求“清峻”风骨之美	(37)
 第二章 充满玄理哲思的正始之音	(43)
第一节 玄学的兴起与士人的崇尚	(43)
第二节 文学创作倾向的新变化	(49)
第三节 追求“隐曲”之美的创作风尚	(62)
第四节 恶虚求实的审美追求	(65)
 第三章 响逸调远的西晋诗论	(70)
第一节 西晋士人心态的主要趋向	(70)
第二节 西晋时期的文艺思潮	(78)
第三节 繁缛绮合的创作审美追求	(82)
第四节 对文体特征的深入探讨	(89)
第五节 陆机《文赋》在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 贡献	(102)

第六节	“缘情”、“清省”的文学观与美学观·····	(125)
第七节	讽谕典怨之风与建安风骨的再现·····	(133)
第四章	多种艺术审美追求的东晋文艺观念·····	(139)
第一节	东晋文人心态及其所追求的审美情趣·····	(140)
第二节	玄释合流及玄学、佛理入诗的创作倾向·····	(150)
第三节	葛洪的文艺美学思想·····	(156)
第四节	陶渊明所追求的新的审美创作倾向·····	(168)
第五章	追求新变的南朝文学意识·····	(181)
第一节	元嘉文学思想的审美转变·····	(181)
第二节	永明文学思想的新变化·····	(190)
第三节	对文学特征的认识与文笔的探讨·····	(207)
第六章	体大思精的文论巨著·····	(216)
第一节	刘勰的生平思想与《文心雕龙》的成书·····	(216)
第二节	刘勰主要文学思想倾向·····	(220)
第三节	《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	(229)
第七章	思深意远的诗论专著·····	(263)
第一节	中国诗话的开山之祖·····	(263)
第二节	钟嵘对诗歌的理论建树·····	(269)
第三节	钟嵘对历代五言诗的品评·····	(280)
第八章	“重乎气质”的北朝文学观念·····	(288)
第一节	北朝文化环境对北朝文学思想的影响·····	(289)
第二节	重功用、求质朴，豪放的创作思想倾向·····	(293)
第三节	别具特色的诗论·····	(297)

引言

魏晋南北朝，上起建安，下迄隋统一，历时近四百年的历史。在这近四百年期间，文学意识发生了很大变化，显示了它的独特风貌，而且在这一时期的不同阶段，也有各自的特点。本书就是对这个时期的文学意识的历史嬗变状况进行了研究，并探讨它在中国文学思想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

—

魏晋南北朝时期，社会一直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历史情况异常复杂。东汉后期，由于统治阶级残酷压榨人民，大肆兼并土地，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再有宦官、外戚的交相干政和互相倾轧，更造成了政治的极端黑暗和腐败。这时，又有西羌的连年用兵，以及水、旱、虫等各种自然灾害，使当时的社会矛盾更加尖锐，终于爆发了黄巾农民大起义，给东汉政权以沉重打击。但在此同时，一些豪强在镇压农民起义中扩充了军事力量，纷纷拥兵割据，使中国社会进入了长期混战、民不聊生的状态。长期混战，严重地破坏了社会经济，呈现在人们面前的是“白骨蔽平原”、“千里无鸡鸣”的社会现实。在割据的军阀中，曹操对现实有比较清醒的认识，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措施和政治措施，逐步统一了北方。建

安二十五年(220)曹丕代汉,而孙权、刘备也相继在据守的东南、西南地区称号建国,形成了魏、吴、蜀三国鼎立的社会局面。公元265年,司马炎代魏建立了西晋王朝,不久,便统一了全国,使社会暂时得到了稳定。但好景不长,晋武帝死后,为争夺权力,八王乱起,前后达十六年之久,统一的局面又被打破了,社会经济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西晋王朝只维持了半个世纪便覆亡了,全国又进入了南北长期分裂的时代。

西晋王朝灭亡后,一些大官僚贵族逃到江南,与当地豪绅贵族们联合起来,推司马睿为皇帝,于公元317年建立了偏安江左的东晋王朝。东晋王朝与西晋王朝同样,对人民变本加厉的剥削,不断爆发内战,使人们遭受更大的劫难。公元420年,在镇压农民起义中兴起的刘裕废晋帝,建立了宋朝,结束了东晋王朝百年的统治。从公元420年到589年隋灭陈,一共是一百六十年,南方经历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史称南朝。由于南方地区长期以来比较安定,社会经济与北方相比,相对得到了繁荣和发展。从西晋灭亡之后,北方进入五胡十六国时期。人居中原的匈奴、鲜卑、羯、氐、羌五族统治者不断互相攻杀兼并,使社会经济、文化又一次遭到严重破坏。公元423年,北魏太武帝完成了黄河流域的统一战争,结束了长期混战的局面。后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后来又分别为北齐、北周所代替,一直到公元581年隋朝建立,全国统一。社会的动荡分裂、政权的频繁更迭,对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从汉末到隋统一近四百年中,由于社会环境的动荡混乱与各朝政权的急剧交替变革,汉代盛极一时的儒家思想逐渐失去了统治的力量。随着儒道的衰微,文人的思想得到了极度的解放。他们敢于对天道、天命之说大胆地提出怀疑,破除对神仙的迷信。在思想解放的同时,各种思想、思潮纷纷产生,正始前后刘劭的《人物志》出现了。《人物志》探讨的主要问题是

与政治上用人相关的人物品藻。将品藻人物由道德水准转向所评论主体的才能、个性、智慧上。并且又提出了与人内在的智能、德行、情感、个性相关的神、精、筋、骨、气、色、仪、容、言“九质之征”。与刘劭同时代的何晏，将刘劭的这种具有政治性人物品藻朝着两个方面转变，正如美学家李泽厚所分析的那样：“一个是从政治上如何鉴别任用人才转向对理想的社会政治和人生的意义价值的哲学探讨，由此产生了玄学。另一个是从政治需要出发的对人物个性才能的评论转变为对人物才情风貌的审美品评。这在两晋时代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并直接地影响到文艺和美学（《中国美学史》）。可见，从刘劭的人物品藻到何晏、王弼为代表的玄学是这个时期主要的思想文化背景。

玄学在魏晋时期迅速地发展起来，并且在魏晋南北朝的近四百年间得到广泛流行。魏晋玄学是由道家思想发展而来，《文心雕龙·论说》篇指出：“迄至正始，务欲守文；何晏之徒，始盛玄论。于是聃周当路，与尼父争涂矣。”玄学思想虽以老庄的面目出现，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先秦老庄思想，而是适应当时社会现实的需要而产生的变种的老庄思想。它侧重于对本体的研究，以“无”为体，以“有”为用，崇尚自然，以自然为体，以名教为用，即有关天地万物存在的根据问题。如从王弼等人关于言、象、意关系的论述中就可以充分地显示出来。这些都说明了玄学的形成和发展对文学所起的重要影响。

佛学在这时也得到了很大的发展。这个时期由于阶级矛盾、社会矛盾、种族矛盾等表现得异常激烈，人们的生活，无论是物质还是精神又遭到了空前劫难，这样的社会环境，有利于宗教思想的传播，特别是佛教得到了迅速的传播与发展。东汉后期，大乘佛教经典、小乘佛教经典相继得以系统传入中国；汉末和魏晋南北朝时期，佛经大量翻译成中文，出现了许多译经大师，如竺法护、释道安、鸠摩罗什等。许多佛经都是

由印度或者西域僧侣与汉人共同切磋而翻译成的，所以翻译过程也是思想与语言文学的交流过程。翻译过来的佛经，其中一部分本身就是很具有文学特色的文学作品。如《维摩诘经》、《法华经》、《楞严经》等，常被人们作为文学作品来读，深受人们的喜爱。此外，在文体、意境、声韵等方面都对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东晋之后的情形更为明显，南渡之后建立的东晋王朝，一直面临着战乱之苦，为封建帝王精神支柱的儒家思想又一次受到冲击，于是玄学清谈之风再呈高潮。这时，人们对人生的慨叹以及对“情”的看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在这种思想文化氛围下，人们更加追求富有审美性质的才情、风度、言谈等。不仅如此，江南秀美的自然风光也吸引着人们，所以这时便产生了纵情山水的风尚。人们用审美的眼光来观照“千岩万壑”、“云兴霞蔚”、“山川映发”等自然景观。由于玄学清谈之风大兴，自然重视玄学所说的“神”、“神明”，因而更加追求与佛相联的超脱的“玄远”、“神明”。就是这个时期所追求的审美境界与审美意韵。佛教对中国古代思想、文化艺术的影响是巨大的。

这时文学成就辉煌，其明显的标志就是作家辈出，文体多样。建安时期曹操、曹丕、曹植是当时文坛领袖，在他们周围聚集了很多著名的文人，如建安七子，还有蔡琰等。正始时期主要诗人是“竹林七贤”等，他们虽寄情山水竹林，但其中的阮籍、嵇康则对司马氏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其创作具有“建安风骨”。西晋时期，太康中有三张（张华、张载、张协）、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尼、潘岳）、一左（左思），号称文章中兴，其中左思的诗歌情调高亢，笔力矫健。太康之后，在诗史上有永嘉之称，主要代表作家是刘琨和郭璞，他们的诗作或写家国之痛，或抒愤世之怀。东晋时期产生了伟大诗人陶渊明，他是江南上空的一颗新星，诗歌创作达到了清新自然的境地。宋初著名诗人谢灵运全力创作山水诗，以描写山水景色著称；鲍照以

写乐府诗而闻名。齐时竟陵王萧子良周围聚集了许多文人，其中沈约、谢朓等八人，号称“竟陵八友”。这些文人的创作显示了不同的风格，诗歌的体式，得到了空前发展。文学的各种表现手段、各种表现技巧纷纷出现，可谓斑驳缤纷。这个时期赋体文学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风格各异的抒情小赋应运而生，标志着辞赋创作进入了新时期。如曹丕、曹植、王粲、祢衡、向秀、潘岳、陶渊明、鲍照、庾信等作家，创作了众多的辞赋作品。这时的赋所表现出的千姿百态的体式，情采缤纷的风格，优美精湛的技巧，构成了这时期赋精美多姿的艺术风格特征。这个时期散文、骈体文有突出的发展，出现了创作的高潮。小说这一文学形式，在先秦还只是处于胚胎时期，萌芽于两汉，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则出现了如曹丕《列异传》、干宝《搜神记》等志怪小说和邯郸淳《笑林》、葛洪《西京杂记》、刘义庆《世说新语》等，为我国小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思想就是在这样活跃的思想文化背景和文学创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创作与理论之间双向流运动是文学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文艺的发展也促进了文艺思想的繁荣与发展。

二

魏晋南北朝文学思想与当时文学创作一样繁荣发展。魏曹丕的《典论·论文》、西晋陆机的《文赋》、挚虞的《文章流别论》、梁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等文学理论专著的出现，是这时文艺理论发展的重要标志。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文学成为独立的门类，并重视文学的地位与作用。当然，文学门类的独立与对其地位的认识有漫长的过程。文学在

汉代，主要是指学术，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有了独立的学术地位。曹丕在《典论·论文》中指出，文章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说它要比“年寿”、“荣乐”更重要。曹植不仅对那些“俨乎若高山，勃乎若浮云，质素也如秋蓬，摘藻也如春葩”的作品重视，还提出要重视民间文学的主张。应场于《文质论》中在肯定文的政治作用的同时，充分肯定其赏心悦目的美感作用。陆机在《文赋》中论述了文学的作用。挚虞在《文章流别论》中也阐述了文章的功能和用途。到了南朝，文学彻底独立出来。范晔在《后汉书》中特立《文苑列传》与《儒林列传》。梁萧统在编《文选》时，把文学与经、史、子区别开来，对文学作品选择的标准是“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墨”。与此同时又有文笔之分，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指出：“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其后梁元帝萧绎又进一步指出文笔之区别，强调文之情感的抒发与语言的形式之美。文学的特点越来越鲜明，其独立性显然可见。

(二)这个时期对文体的探讨相当深入，前所未有。对文体全面系统的论述始于魏晋。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论述了八种文体的四种标准，即“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其后，皇甫谧为左思《三都赋》作序，进一步论述了赋的要求标准，指出赋“文必极美”，“辞必尽丽”，“美丽之文，赋之作也”。皇甫谧是第一个将诗和赋分开，而又是单独论述赋的特点的人。其后，陆机在《文赋》中论述到了诗赋等十体所具有的风格特点，比曹丕所论的四科八体更为详细了。其中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就是“诗缘情而绮靡”的论述，既总结出了诗歌所具有的抒情的特质，又概括出了诗歌应具有美好动人的标准，进一步推动了人们对文体的研究。挚虞的《文章流别论》主要是文体论，对后来文体研究者影响甚大。刘勰的《文心雕龙》、萧统的《文选》等基本承袭此分